

张学良生涯论集

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



笛
编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

新编张学良资料丛书

张学良生涯论集

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

漠 笛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邓小飞
特约编辑 肖漠玲
装帧设计 萧 萧

张学良生涯论集

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

姜 笛 编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60,000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260—8810 册

ISBN 7-80091-176-4/C · 121

定 价 6.00 元

目 录

略论张学良将军	常 城	001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的爱国之举	刘培植 任振河	013
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斗争	杜连庆	017
张学良枪毙杨、常原因浅析	王维远	029
张学良真的掷过银元吗?	刘 润	037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	杜连庆 陆 军	039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	吕明军	049
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	〔日〕土田哲夫	057
论张学良时期东北经济的发展	王维远	076
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的财经	荆有岩	087
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赵守仁	098
张学良下野浅论	张子清	105
论张学良将军的革命转变	王维远	118
评张学良将军的思想演变	赵守仁	125
张学良是怎样走上抗日联共道路的	张魁堂	134
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历史探原	张桂英	155
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抗日义勇军	卞直甫 王鸿宾	172
张学良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思想转变	张梅玲	181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政治思想的转变	张桂英	187
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能联合发动西安事变	陆永山	198
杰出的贡献 光辉的业绩	房成祥	208
东北军与西安事变	周 毅	222

西安事变新论	张仲良	228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学君	240
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	鱼汉胜	251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丁胜利	266
论南京政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孙立升	279
双十二兵谏之伟大意义	雪 风	286
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常 城 何健沙	289
张学良与明史研究	宋纹璜	303
结 论	〔美〕傅虹霖	309

略论张学良将军

常 城

张学良将军是举世闻名的人物，向为世人所瞩目。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曲折、复杂、伟大而又坎坷的路。当西安事变 50 周年到来之际，为纪念这位“特别使人怀念”的人物，对他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他的历史功绩，作一概略的评论，对推动祖国的统一，是很有意义的。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以他被“软禁”为界，可划分为他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在前半生中，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还不到 20 年的时间！

这 20 年，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年代，一方面是旧军阀的统治、混战与垮台，国民党的统治与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斗争。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年代。

在这些年代里，张学良的政治活动，随着历史的巨变，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是他随父“从政”的时期。当时，他还是军阀的“贵公子”，是国内外闻名的“四大公子”之

一^①，生于权门，养尊处优。他父亲聘中外教师培养他，指望他光宗耀祖，称霸一方。在张作霖宠爱有加的环境下，年将二十，即出掌军旅。由卫队营长，旋升旅长、军长、军团长和“方面军”的最高将领，成了奉系军阀中的主要人物。在北洋军阀时期，他追随其父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军阀混战，并率奉军主力，对抗革命的北伐战争。

年轻的张学良，由于受过较多的教育，虽然也“具有一般知识青年的民主爱国思想”^②，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与郭松龄、阎宝航、杜重远等爱国、进步人士相友好，但他当时的行动主流，却仍追随其父，基本上还是旧军阀营垒中的重要将领。

从张作霖被炸到九一八事变前，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他独自主政东北的时期。国难家仇交织一身，使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显著的变化。

1928年7月，他上台伊始，即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他不顾日本田中内阁的阻挠、恐吓和软化，毅然实现了“东北易帜”。有人说：东北易帜，是东北统一于蒋介石，无任何进步可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它没有看到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众所周知，当日本特使林权助，以张作霖“老友”自居，用长辈口吻，命令张学良，绝不许他“易帜”时；张学良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与贵国的天皇同庚（同岁）^③（即位居你上），焉能受尔之命？”

从此，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推行了一系列的反日政策，支持群众的反日斗争。在他的支援下，由阎宝航、车向忱等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等，提出“收回旅大”、“打倒满铁”等鲜明的反日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反日宣传。当年，人民的“护路”斗争，遍于东北，对日本攫取我国铁路权的阴谋，给以沉重的回击。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已陷低潮，东北的反帝斗争，却蓬勃而起。虽原因诸多（如日本侵略东北的加紧和党在东北的活动），但与张学良的反日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在推行反日政策的同时，又努力倡导东北

地区的建设,兴修铁路,开筑葫芦岛港;“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纺织、窑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教育事业,增拨教育经费,发展各县中小学……扩建东北大学”,自任东大校长^④,取消封建的尊孔读经,提倡反日的爱国教育等等。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张学良将军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

但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却犯了两大历史性错误:一是1929年,在蒋介石和美国唆使下,借“防止赤化”之名,轻率地挑起了“中东路事件”,单方撕毁“中苏协定”,驱走苏方人员,派兵十万与苏联红军开战。结果损兵折将,劳民丧财,败后乞和。这不但损害了极宝贵的中苏友谊,为亲者痛,仇者快;也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另一错误是:在1930年,当国民党各派混战达于高潮、在蒋介石和反蒋派胜负难分之际,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勾引、利诱下,不顾日本入侵东北的严重危机,举兵入关,使东北国防空虚,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可乘之机。由此,他因助蒋有“功”,取得了南京政府的要职(海陆空军副司令),统辖了北方八省(东三省、华北五省),恢复了其父往日的地盘。这时,年仅三十的张学良,跃居显位,成了南京政府中仅次于蒋的人物和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当他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时,蒋在南京,举城迎接。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他“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⑤这时是张学良的势力达于“顶峰时期”。同时,因“踌躇满志”,生活无度,吸毒严重,也是他“在意志和精力上……落到最低线上的时期”^⑥。

从九一八事变,到下野出洋,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三个时期。

九一八后,国难当头,身为东北的首脑,是守土有责的。但他却听命蒋介石,执行蒋之不抵抗政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一听蒋介石的摆布。”^⑦

应该指出,他虽然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与专心“剿共”、“宁亡

于日，勿亡于共”的蒋介石，是有显著区别的。他很想抵抗，也确实进行了局部的抵抗，如组织锦州、榆关、热河的抵抗；多次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慰问、鼓励东北抗日义勇军；拨巨款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当他的族兄弟张学成叛国被擒时，他主张“立即枪决”等等。但这些抗日举动，是很有限的，也是不坚决的。其所以如此，除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指示和幻想国联干涉外；他认为，要抗战，单靠东北军是难以取胜的。九一八的第二天，他即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需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⑧。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剿共”，拒不发动全面抗战，张学良为保其残余实力，也只有忍痛从之。结果，在全国人民反蒋反张的声讨下，蒋介石为舍车保帅，用苦肉计，使张下野。他对张说：“我二人共乘一舟，但目前风浪太大，两人同乘，必有覆舟之险，应当下去一个人”^⑨。张无可奈何，只好“代蒋受过”，下野出洋。这是他一生中的首次下台，失意之情，难以言喻。

下野出洋的张学良，本应静思既往，总结教训。但年轻的张学良，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对蒋仍无认识。他在意大利等国，虽不到一年，但受毒很深，他欣赏“讲独裁，不讲民主。拥护一人为领袖的法西斯主义”。错误地认为，法西斯是德意“复兴”之道，也是中国的“复兴”之道。因而回国后，“高唱拥护蒋介石，一切唯蒋之命是听”^⑩。随着政治上的失意，思想上也误入了歧途。

从随蒋“剿共”至“西安事变”，是他悬崖勒马，决心联共救国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变时期。

出洋回国后，于1934至1935年，他受蒋之命，在“寇深祸极”的形势下，走上了他不愿走上的“剿共”之路。他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在这条绝路上，他越走越不通，越走越痛苦。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迫使他不能不悬崖勒马转变方向了。

促使张学良从随蒋“剿共”转为联共抗日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主要作用的：一是他的“剿共”战争的惨败，和由此而尝

到了蒋之冷遇；一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和党对东北军的耐心诚意的争取。

起初，张学良及其高级将领对“剿共”是很卖力的，他幻想“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之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但在西北，他“剿共”3个月，折兵近3个师，2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战死或被俘，这是东北军几十年历史上所没有的，给他以深刻教训。

由于“剿共”的挫败，他进一步尝到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苦汁。对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削弱之，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其军饷。甚至连张学良为阵亡者所请之十万恤金，也被拒绝，以至张悲愤感叹：“我的名望，已降低到不值十万块钱！”^④特别是1935年11月，当他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时，败军之将，大受奚落，与1930蒋对他的盛大“恭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对张是莫大的刺激。他深深感到：蒋对他“已不重视”，“内心开始动摇了”^⑤。

同时，因反共内战，张之所部已“军无斗志，士多反蒋”^⑥九一八后，他们背井离乡，痛感国破家亡之苦，大声疾呼：“与其与共产党打仗，还不如和日寇拚命”。在红军教育下，他们有的与红军联欢，有的自动放下武器。军心的动摇，对张学良的推动是极大的。

这时，日本侵略者已渗入华北，踏进绥远。抗日与反共的矛盾，国民党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独裁与民主的矛盾，在西北地区，尖锐地交织起来。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高潮。

民族危机的形势，共产党的伟大号召，和广大军民不可遏制的抗日救国洪流，推动着苦闷彷徨的张学良将军。他想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代蒋受过，遭到全国人民的指责；看当前：作蒋介石的“剿共”工具，“既挨红军的打，又受‘中央’的气”，甚至整

个东北军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他目睹全国的形势，认识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只有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以前的耻辱，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共产党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我开始想到，我们的政策失败了。为此，我征询部属的意见，结果提出的建议是：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求合作，停止剿共战争，保存我们的力量，团结其他方面共同抗日”^④。

于是，张学良开始了他一生中的转变，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从1935年末开始，他主动接近东北进步人士李杜、杜重远等，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党早就重视对东北军的工作，立即派李克农、刘鼎、宋黎等同志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亲切而诚挚的会谈，并留在他身边工作。党还通过教育释放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等），说服、推动张学良。特别是毛泽东亲派周恩来，于1936年4月，在延安天主教堂与张会谈，解决了张的各种疑虑，“对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⑤。从此，张学良的政见完全转变了。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在党的帮助下，在西安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工作，建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骨干；成立东北军学兵队，吸收中共地下党派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和一二九革命青年；成立“抗日同志会”，作为东北军的核心力量，参加者全系进步革命的青年干部，不少共产党员，如栗又文、张潜华、宋黎、解如川、刘澜波等均系该会的成员。在西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张、杨的支持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先后成立。所有这些标志着：在西北，党与张、杨“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了。

从上述张学良前半生四个时期的简要评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所走过的道路，确实是曲折、复杂的，进一步（如“东北易帜”后的反日斗争），退两步（如执行“不抵抗政策”和随蒋“剿共”）；但

终于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全国人民反日怒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的正反面教育下，毅然实现了他跃进性的转变，从旧军阀的“少帅”，变成了联共抗日的救国将领。

张学良的转变，不是偶然的。除了客观外因对他的巨大推动之外，还有他主观的内因，即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

他自幼即生长在日本侵略下的东北，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气焰，是极其厌恶的。他不满其父对日本的妥协退让，为此，“父子间曾大肆争吵”^③他对“晃着肩膀、耀武扬威”的日本顾问们，极为反感；他痛感：让日本“浪人”、妇女在沈阳街头“穿着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摇过市”，是中国的耻辱^④。1928年，他上台后，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他随蒋“剿共”，但“并不热心于内战”，时刻不忘侵略者。在武汉时，他以“苦水”招待东北同乡的集会，使之不忘亡乡苦；“在言谈中，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他时常和他的同事，“谈他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宣战，好收复东北，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⑤

这些都充分说明：张学良虽有他拥蒋“剿共”的一面，也有他反日爱国的一面。他对抗日始终是忠诚实意的，对反共是消极的，他的反日爱国思想是长期形成的。特别是日本炸死他父亲，侵占他的地盘，使他的军队损失一半以上，财产损失百万以上，这样特殊的遭遇，怎能不使他不产生强烈的反日爱国思想呢？

过去一些书刊，在谈及张学良思想转变时，主要强调他受客观外因的逼迫，而忽视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的内因，这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

二

张学良的转变，集中地表现在他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他们“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

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⑨

西安事变前，张、蒋间的矛盾，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尽管张学良一再对蒋介石“苦谏”、“哭谏”，要他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尽管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国共合作”的密谈，已正在进行；但蒋却一意孤行，举兵西北，逼张“剿共”，妄图在短期内（两周或一个月），一举消灭红军。

在“逼上梁山”的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忍无可忍，破釜沉舟，临潼捉蒋，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完全“为了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⑩张学良将军在发动“事变”时所表现出的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旧将领来说，是罕见的。

西安事变与过去的军阀争权不同，也不同于一般的军事政变。它不是为了个人和某个集团的私利，而是出于善良的抗日救国愿望，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发动的。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张学良将军在谈他发动事变的想法时说：“我们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⑪；“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的纯洁的”^⑫。他号召所部：“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他说：“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⑬。

当临潼捉蒋还没有找到蒋介石时，张学良焦急万分，他激动地对所部将领们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⑭。

过去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有关刊物，在评论西安事变时，主要

强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伟大意义，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功绩，却缺乏应有的评价。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过去历史研究中“左”的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许有暗中保护张学良的意图。历史研究应实事求是，特别是今天，我们更应如实地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绩。不但要赞扬他为国家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更要象周恩来同志那样，高度评价他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巨大贡献。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下，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是国内革命、进步势力、抗日反蒋势力，和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历史的必然性，……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⑤。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将军无疑是比其他任何人都处于关键的地位。没有他在西北的出现，没有他和共产党的联合，西安变动的发动是难以实现的。

当时，正处于民族危机的关头；红军在长征中已大大削弱，刚刚到达陕北，处于地瘠民贫的环境中；蒋介石不但逼张“剿共”，而且调军30万众，向我少数的红军进攻。困难是十分严重的。一场大的历史曲折将有不可避免之势。在这紧要关头，张学良、杨虎城，反戈一击，临潼捉蒋，强迫蒋介石“放下屠刀”，停止他急不可待的反动“剿共”计划，挽救了民族危机，帮助了中国革命，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的实现。因而周恩来同志对张、杨的评价是很高的，称他们为“千古不朽的人物”，誉之为“千古功臣”！^⑥

早在1925年，爱国将领郭松龄在倒戈反奉时，曾致信张学良，愿他“作新世界的主人”，不作“旧时代之桀桀”；愿“他为平民所讴歌”，不“为政客所崇拜”^⑦。但那时的张学良，还不能摆脱他的“愚忠愚孝”。只有经过历史教训和共产党的帮助，他才在民族危急的关头，有了巨大的转变。

张学良将军不但在西安变动的发动上，立下了“丰功”；而且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上，也树下了“伟绩”。

西安事变虽是非凡的创举,但事变本身还不能立即促使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为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因此,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关键。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另一历史功绩,就是他和我党解决事变的方针不谋而合,始终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他十分敬佩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公无私立场,紧密地与我党合作,冲破了各种阻力,终于粉碎了南京政府亲日派何应钦之流,妄图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扩大内战的阴谋;说服了东北军少壮派的“审蒋”、“杀蒋”等要求。经过审慎的谈判,在迫使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的基本要求之后,断然放蒋回南京,使西安事变,尽快地和平解决了。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将军在送蒋问题上,虽不够慎重,不与他人协商,不顾妻儿跪劝,仓忙送蒋回南京,以致为蒋长期扣押;但送蒋也确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其历史功勋。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③。

张学良送蒋,既有助于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是为国无私的壮举;而蒋背信弃义,则为国人唾弃。

张学良将军为抗日救国,为国共合作,身陷囹圄,已整整半个世纪了。今天,为了祖国的统一,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宏图,受到了海峡两岸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呼。值此西安事变 50 周年之际,我中华儿女,都热切期待着祖国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热切地盼望张学良将军,在他有生之年,能重返故土,叶落归根!

注 释

- ① 所谓“四大公子”即张季直之子张孝若，段祺瑞之子段洪烈，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张作霖之子张学良。
- ② 孙达生《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辽宁文史资料》第8辑。
- ③ 1928年8月19日《国闻周报》。
- ④ 孙达生《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 ⑤ 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
- ⑥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
- ⑦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
- ⑧ 洪钊《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
- ⑨ 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
- ⑩ 车向忱《西安事变杂谈》。
- ⑪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0页。
- ⑫ 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65页。
- ⑬ 车向忱《西安事变杂谈》。
- ⑭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0页。
- ⑮ 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20页。
- ⑯ 参见野田凉《满洲建国与在奉天活动的主要人物》，第3页。
- ⑰ 松本一氓《被遗忘了的贵公子》。
- ⑱ 王兰等《蒋总统与中国》第120页。
- ⑲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4页。
- ⑳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
- ㉑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
- ㉒ 《张学良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1936年12月14日）。
- ㉓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
- ㉔ 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54页。
- ㉕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 ㉖ 《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⑦ 见赵毅《郭松龄的崛起》附录。

②⑧ 《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